

《金色笔记》的事件性与文学本质阐释*

孔令然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25)

提 要: 特里·伊格尔顿从文学哲学的视角探索“文学本质”的运作机制,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可以实现文学自身的意义,在阅读行动中的自我实现即事件,读者的阅读行为是不断重构文学事件的“结构化”过程。本文将《金色笔记》作为“事件”探寻“文学本质”的运作机制、文本形式的“结构化策略”及作品的道德空间,最后从文本、读者、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中操演性解读《金色笔记》中的“文学事件”。

关键词: 《金色笔记》;文学事件;文学本质;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3-0117-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3.019

On the Eventalization and Literature Essence in *The Golden Notebook*

Kong Ling-r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Terry Eagleton explore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literature ess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philosophy, that is, literature is inevitably considered as structure in the sense of self-realization, and event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The structuration process of the literature event is reconstructed by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Considering *The Golden Notebook* as the "ev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literature essence", "structuration strategy" used in the forms of text and its moral space. By way of the dramatic dialogue between the text, the readers and the author come the perf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events" in *The Golden Notebook*.

Key words: *The Golden Notebook*; literature event; literature essence; structuration

21世纪以来,“事件哲学”深刻地标示出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现代情境让哲学不得不直面事件本身,并深刻影响文学哲学(刘欣 2016:82)。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梳理众多文论并呼吁文学理论研究要回归文学本身,从文学哲学的层面探讨文学本质以及文学阅读策略;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立场提出,文学具备伦理学价值,参与对世界的建构。“事件”逐渐成为解说作品/文本的关键术语,发现“作为事件”的文学显现的结构化策略,赋予文学不断更新的“本质”;探索文学“本质”的运作机制成为有意义的活动,因此,事件性作为文学的存在方式就成为文学永

恒不变的“本质”。

多丽丝·莱辛在其代表作《金色笔记》的前言里说,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创作观念与志趣进入这部作品的构造中:其一是把握时代意识形态的脉搏,以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为榜样,创作出像《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那样反映“知识与道德风貌”的作品;其二是艺术家作为范例的主题,如患“障碍症”的艺术家,艺术家与“主观性”的联系;第三是表达对英国传统小说的不满,从而继承欧洲小说传统,从文学哲学的角度,借助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让“作品注解自身”;最后,莱辛以3封读者的来信为例,说明不同读者受制于不同文学理论对作品的理解千差万别,可是“一本书内在的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艾伦·金斯伯格诗作中的中国观研究”(17WWD222)的阶段性成果。

生命是它的形式和形态”,只有引发读者思考与探索、理解小说的构思和旨趣,文本才具有“再生效应”。莱辛以上几点创作思想基本涵盖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作者承担的时代责任、文本形式与内容相互运作,以及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由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理论,从文学哲学的视角探索文学“本质”的运作机制。

1 “本质”的建构:写作障碍的突围

莱辛在《金色笔记》的长序中坦言: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这一点被人们忽视,原因之一就是这部作品更多地继承了欧洲的小说传统,而不是英国的传统(莱辛 2000:8)。这可以追溯到欧陆理论与英美哲学的不同思想传统,伊格尔顿形象地说,欧陆理论家“总是敞着衬衫领口”,而英美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拘谨地系着领带”(Eagleton 2012:X),可见前者开放大胆,后者严谨保守。伊格尔顿将两者明确区分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哲学”,1983年的《文学原理引论》梳理并介绍20世纪欧陆的现象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和精神分析等文学理论。时隔30载,他在《文学事件》中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哲学做出调节与重构,因为前者对真理、指涉、虚构的逻辑状态等问题缺乏热情,后者对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不感兴趣(同上:X-XI)。莱辛创作《自由女性》的本意是想谈对英国传统小说的不满,并觉得自己所处的文学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所以她结合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取的从整体认识事物的批评理论,尝试创作一部作品注解自身。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哲学”的区分,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学术态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与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大陆哲学在伊格尔顿这里关系十分融洽(阴志科 2014:186)。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提出文学的5大特征引发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即:其一,虚构性;其二,对人类经验提供值得注意的洞察而非仅仅只是经验性事实的报告;其三,以自觉的方式对语言加以提炼,富于修辞性地使用语言;其四,不具备像购物单一般的实用性;其五,被视为写作的高级形式(Eagleton 2012:25)。

《黑色笔记》中安娜一直定不下心来再写一部小说,为自己没有能力写出“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而产生写作障碍,是因为她在努力重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模式,探求并建构文学的本质(莱辛 2000:64)。安娜结合撰写评论文章时的阅

读经验发现:“小说的功能”已经成为“新闻的先驱”,大多数称得上成功的小说只是将有新意的报道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中。安娜指出“一般意识”的好奇、“苏格大娘”的心理分析得出的“道德标准”会摧毁艺术的价值。于是安娜尝试“不以事实真相”出现的虚构形式,以及在《金色笔记》中尝试“操作文字,希望某些组合”能表达她想说的话,却发现“真实的经历是无法描述的”(同上:624)。可见,安娜的作品已经具备伊格尔顿所述文学特征的前3项。那么莱辛与安娜对文学本质的探求就此止步了么?答案是否定的。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指出作为具体存在的文学作品,内容上的道德性、虚构性、语词上的修辞性等并不是“文学的本质”,文本成为一种行动性的存在,解释文学本质如何运作才是核心问题。安娜援引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通过小说对生活做出哲学阐释的观点,说明小说的本质是其“哲学性”。“哲学性”是莱辛提倡的小说创作的理想目标(胡大芳 2016:123)。这种“哲学性”对伊格尔顿来说,就是解说“文学”作为富有本质色彩的定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安娜认为有关马雪比的文学描写只是事后的分析,《黄色笔记》中对艾拉和保罗的情感困境的描写是从二人关系解体的角度入手,把艾拉的外部活动与内在情感割裂开来,也属于事后分析,而文学如同生活一样,其标志是它的物理质量,不是事后的分析(莱辛 2000:222)。于是她决定必须再读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意大利哲学家马斯雅维利和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等的作品,将文学价值置于常规设想与批判反省之间。《黑色笔记》的最后一卷记录安娜1956年9月的一个梦,别人改编的有关马雪比旅馆的影视剧使安娜觉得自己“记得的”事情并不真实,有点“心烦意乱”(同上:522),这也是安娜写作障碍的表现。《黑色笔记》最后一卷的时间应该在第三卷之前,因为第三卷是从1955年11月11日记起,然后是次年4月17日,再接下来便是1957年复活节周的日记。直到哈里建议安娜逆流而动,放下“一贯自我标榜的渺小而独立的个性”(同上:432),着重写出殖民地的基本状况和白人的悲剧,尝试不偏袒任何一方地将《战争边缘》改编成剧本,安娜才开始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觉得“自己更接近了现实”(同上:433)。纵然苏联党刊指责小说没有深入到意识形态,安娜却能淡然处之,感觉“现实像长了白色翅膀的鸟撞击着我的心胸”(同上:434)。由此,

安娜从写作障碍中突围,开始尝试重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模式,她只是让读者感受到“真实性”,使文学与现实形成强烈的互文性。那么“建立一种打通内在与外在、幻象与现实的逻辑”,其核心问题是“文本如何成为一种行动性的存在”(Eagleton 2012:134)。由此,文学本质的问题便是本质如何运作的探究。安娜从创作迷惘到重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使读者亲历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张力。

莱辛在前言中也曾表示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患“障碍症”的艺术家,有必要给这个人物设置一个障碍,到头来必然出现某种反拨。同时,她这样描写自己创作《金色笔记》的体验:

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难写——我脑子里有个计划,我按这个计划连贯地写下去,这本身就有难度——而且因为我需要一边写一边学。预先给自己勾勒出一个严谨的结构,并设置诸多限制,这种做法也许能挤压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开始写作时,突然冒出的许多观念和经验,我都认不得是否属于自己了。先不用说用于写作的人生经历,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难忘。它简直改变了我这个人。(莱辛 2000:4)

莱辛认为一本书内在的生命力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显然,较之作者的个人意图,文类规则和历史语境显得更为重要,所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感到痛苦,这也是安娜有写作障碍的原因之一。伊格尔顿认为文类自身有其意图,有可能限制并且改写作者本人的意图,或者说,当作者操持某种文类时,此文类所做的事情胜过作者自己想做的事情。文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某类文学作品的语法,伊格尔顿援引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语法的本质是世界与语言先天地编织在一起。因此,安娜试图创作19世纪反映社会道德风尚的作品便开启了对文学本质的追求,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过程需要安娜重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模式,核心的任务便是有意识的文本形式如何成为一种行动性的存在,即文本的运作机制。

2 事件的性质 “结构化”策略的道德空间

伊格尔顿回归文学本身,建构性地转向文学“本质”的运作机制,与莱辛“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的创作本意一拍即合(同上:8)。伊格尔顿提出“结构化”(structuration)概念:结构化表示一种结构,当然它是动态中的结构,人们不断根据它要实现的目的进行重构,同时考虑结构产生的新意图,因此就出现事件的性质(Eagleton

2012:199)。结构化在结构与事件中调解,其策略就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持续摆动。生命体验转化为物化形态,形式一开始就参与作品创造,形式的变化可能引发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冲突又有可能转化为形式的某种处理,终会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文学在特定语境中为自己争取到的可能性:文学构建与自身的联系,故能建立其与现实的联系。由此,文学作品的解读便不再是针对作为实体的对象,而是针对事件(同上:118)。事件的动态过程发端于文学作品以特定的形式策略在特定世界中的出场,把握这些策略才是批评的目的。须要注意的是策略不是特定的形式或固定的结构,结构与事件的中介便是结构化的过程。作品是开放的,是结构与事件、事件与行动等的统一体(同上:192)。

《蓝色笔记》第三卷的行文风格与先前的短句记录不同,而且与其余笔记的内容都大相径庭。安娜反观过去18个月的日记,觉得纸上的文字全无意义,“每页都打上了粗浓的黑叉”(莱辛 2000:462),这些文字“没有成为重现经验的载体”(同上:470),发生的这一切说明安娜正走向崩溃。安娜遭到迈克尔遗弃而严重影响她的个性,她写的东西比她的记忆虚假、不真实,充满自责、自卫和厌恶的特征。这使她逐渐意识到不应该把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不应该将事物分离,更不应该让人格分裂。于是安娜决定选择蓝色笔记专用以记录事实,以文字为形式,依托状态、形式来表现意义。当苏格大娘要安娜“给梦取个名”(给它确定形式)时,她说那是有关毁灭的梦;再次“给它取个名”时,她说那个噩梦是种以恶为乐的法则。这个法则,或者说形象,分别以“花瓶”“又丑又矮的老头”“年迈的老妪”的模样出现,其品格便是“噩梦”“以恶为乐的梦”“给梦取名”(形式),一开始就参与作品创造,形式的变化引发意识形态问题,如安娜感到“威胁”“矛盾”“挣扎”“绝对的邪恶”“毫无人性”,意识形态冲突迫使安娜将其转化为“善恶兼备的东西”(同上:471)。这一有意味的形式使笔记的解读不再是针对作为实体的对象,而是针对事件,以特定的形式策略在特定世界中的出场。安娜并没有模仿“以恶为乐”,而是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建构现实,直到梦中的法则逸出神话,形式的处理以人的面目出现,安娜决定直面感受秉笔直书与此梦有关的种种体验。

随即安娜描写两个“以恶为乐”的代表人物:纳尔逊和德·席尔瓦,进一步强调文学以“事件”

的方式存在。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借用并改造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认为所谓施为性(performative)和描述性(constative)的语言在文学中并没有真正界限,因为文学虚构在用文字描述世界时就已经完成某种行为,这是文学可以成为“事件”的理论前提。以安娜对纳尔逊的描述为例,其外表可靠热心,但他在与太太的冲突中利用安娜作筹码,歇斯底里地辱骂所有女性后,漫不经心地问“我伤害了你吗”?纳尔逊不仅仅是复杂的人物和道德意识含混的典型,因为简单的人物塑造无异于将文学的道德空间局限于自由派的范式,进而安娜将纳尔逊“摧残之乐”的体验物化为自己的感受,将道德转换为一种美德知识的实践。安娜对于“以恶为乐”的道德反思通过其感情起伏的描写得以实现:从“失望”“同情”“无法自拔”“沮丧消沉”到“失去意义”“茫然若失”,最后“说不出话”“愉快而充满怨恨地笑”。安娜并不想唤醒读者“恶”的感觉或移情想象,因为主观知识并不见得会带来实际的道德行动,而是以文字为形式的载体,利用主观心理状态的表达将从未体验过的感情重现,使其成为真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安娜通过“忠于生活”完成作者和读者的道德实践,使文学作品作为道德知识的范式,实现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文本具有的自指性并不是将生动的经验简单地转译为法则和规范,亦非单纯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以一种维特根斯坦语法的方式将现实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并由此借助修辞性“策略”重塑文本细读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为我们提供道德认同的方法(Eagleton 2012:103)。《金色笔记》中的结构化策略是文本自身与诸多历史要素同时作用下生成、影响,使得文学按照自己的内部逻辑来发展进化。安娜四分五裂的精神世界与笔记互为表里,5本笔记中注重个性探索的日记、反映现实生活的简报、典型化的心理描写片段、细节真实的往事回忆拼贴等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形式,与简短的互不衔接的章节、梦境与事物的巧合、连续电影镜头描写等现代主义元素调和,利用复杂的形式进行深度的道德思考,调和各种价值观。小说虽以平实的叙事为基础,但在“香蕉林的血迹”一节,作者表明自己的文学立场,以创造性的想象模仿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并夹杂着抒情、诗化的语言,将生动的修辞与充沛的情感融为一体。莱辛的创作求诸“文学自身的判准”,如复杂的形式、深度的道德、创造性的想象、生动的修辞和

充沛的情感,同时与文类、语言、意识形态和日常经验等历史要素相互影响,使文本和外界相互烛照,又相互独立(同上:48)。

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和《如何阅读文学》等重要著述中,尝试重构文学理论,回归于文学本体和“作家—作品—读者”之“神圣三位一体”的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他在“后信仰时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有益尝试(同上:248)。《金色笔记》序言中,莱辛以19世纪欧洲文学大师们为榜样,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取批评的理论,将创作一部全面描绘时代精神和社会道德气候的力作作为目标,从整体上勾勒出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图景,揭示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困境、生存前景,凸显出女性的特殊困难。莱辛将作品中解决整体性社会危机——“自由女性”向对立统一的整体复归作为事件来理解,回到文学生产的现场,引领读者辩证地体验世界性思维、探寻世界性伦理。

3 解读“事件”:文本、读者、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

伊格尔顿指出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作为实体与作为事件(同上:188)。这种实体/事件的二分法来自阿特里奇(D. Attridge)的《文学事件独一性》一书,在阿特里奇看来,文学是一个操演(述行)性的事件,作者写出文本,文本再经读者解读,都是主体参与的事件,事件是打开新意义和新体验的扭结点和聚会空间。“作为事件”的文学与“作为实体”的文学不同之处在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回到文学生产的现场。《金色笔记》中的文学事件性就是“读者像作家自己那样理解”作为“一本书内在生命的形式和形态”,实现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才能体现出文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莱辛 2000:16)。

《金色笔记》反映出莱辛文学创作、婚姻生活、政治活动多重危机,争取独立自由生活的英国女作家安娜便是莱辛的缩影,尝试通过小说艺术来表现整个时代。小说结构独特,由短篇小说《自由女性》和黑、红、黄、蓝4种颜色的《笔记》两个版块组成,4本笔记的记录时间先于《自由女性》的写作时间。两大版块被锯成4段,相应段落组合在一起,形成4个部分,然后出现《金色笔记》,最后是《自由女性》的尾声。《金色笔记》的译者陈才宇在译后记中提到,许多读者抱怨《金色笔记》不好懂,“因为它的布局就像一个迷宫”(同上:662)。莱辛将外表静态的文字片断组合结构,很难将读者引入正常的阅读轨道,并没有急

于向读者表明什么,而是给读者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激发读者去思考和探索,通过时间性阅读回到《金色笔记》的生产现场。伊格尔顿指出,读者阅读行为即阐释作品的“结构化”策略,作品的内在结构会激发读者感受文学事件动态的“结构化”过程,拓宽事件的维度,进而改变作品的结构。莱辛将裂变的结构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读者从头至尾阅读后,重新按照各自的独立线索把《金色笔记》与原书断片的《自由女性》及4色笔记本分割的部分连缀起来,作为6个独立部分来阅读,实现读者与作家共同体验安娜各个思想层面,逐步透视到她的内心深处,重新整合安娜陷于分裂的精神世界。读者在解读文学“事件”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使“这些争端如何卓有成效地得到解决,或者,看到这些争端如何作为整体呈现出来”,使“文学事件”保持其鲜活性、连续性、开放性、多样性和动态性(Eagleton 2012:224)。

作为“事件”的文学,需要读者悬置先入之见,无功利地去阅读、体察和表演。《金色笔记》出版10年后,莱辛一周内还能收到3封读者来信,分别探讨性战争、政治、精神病主题,莱辛慨叹到“为什么有的人只看到这一面,而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作为作家,他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读者的理解却那么千差万别?”(莱辛 2000:16)很显然,这3位读者的先入之见令他们错过更宽广的文学空间。前文提到《金色笔记》中安娜的写作障碍,关于读者对安娜作品的反馈鲜有提及,而《蓝色笔记》中“苏格大娘”解析了安娜的各种梦,便成为安娜梦的“读者”;《自由女性》中汤姆也是安娜日记的“读者”。作为读者,“苏格大娘”标榜其先入之见,认为安娜童年时所学的是“错的”,才求诸心理分析师的帮助,所以她对安娜梦的解读或皱眉、或反问、或点头不语、或者用神话解释梦境。“苏格大娘”在她“原始的不开化的世界”解读安娜的梦,并没有意识到“有形的事实”,安娜决定中断与她的交往,因为“苏格大娘”的内心早已与安娜分道扬镳,而汤姆却能够以无功利之心阅读安娜的日记。读者表演性地阅读要从理解个体的思想出发,建立个体与共相之间的联系。在谈到哲学和信仰时,汤姆赞同安娜对共产主义“保留梦想”的看法。汤姆在安娜的日记中看到疯癫和崩溃,尝试从自己身上听见安娜的心声,以至于汤姆开枪打伤自己而失明,却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莱辛在序言中表示“描写你自己实

际上就是描写他人,因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喜怒哀乐,你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同上:8)。任何作品都不只是写某个人物的生活,而是反映一种普遍性的维度,这就是结构化的动态性特征。通过“崩溃”进行自我治疗,汤姆的阅读无功力之心,以叙事性表演为指向,更加迫近本真的现实。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作者的文本写作策略与读者的文本阅读策略的双向互动,形成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文学的事件性便是这种策略和背后的深层“语法”(grammar)。

4 结束语

本文将《金色笔记》作为“事件”探讨文学作为一种文类的产生机制,回归“文学本质”。安娜重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模式从“写作障碍”中突围,显现出文学与真实世界的行动实践并开启对文学本质的追求;将“事件”作为文学的存在方式,探讨《金色笔记》中言语的施为性、文本形式的“结构化策略”等文学的内部逻辑及作品的道德空间;将作品中莱辛解决整体性社会危机:“自由女性”向对立统一的整体复归作为“事件”来理解,读者结合自己对社会与生活的观察,回到文学生产的现场阅读文学作品积极发挥创造性、体验世界性伦理,有效地完成结构化过程。从文本、读者、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操演性解读《金色笔记》中的“事件”,由“作家—作品—读者”作为主体参与的事件关联文本内外,建立真实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实践关系,才能为体现文学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找到可能性。

参考文献

- 多丽丝·莱辛. 金色笔记[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胡大芳. 多丽丝·莱辛小说的后现代性解构研究[J]. 外语学刊,2017(4).
- 李晋. “结构化”文学阅读策略——评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J]. 外国文学,2013(2).
- 刘欣. 西方文论关键词——事件[J]. 外国文学,2016(2).
- 阴志科.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 Eagleton, T.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